

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对校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 东北大学档案馆 丁立新 陈均

摘要 中国古代设立官方修史机构从制度上保证修史、注重史官的史德等优良传统对今天校史研究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修史传统 校史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着数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几千年来的积累的史书极其丰富、汗牛充栋。在几千年的历史编撰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尽管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但这些传统仍对我们今天的校史编研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中国古代,有着“官修史书”的传统,即由政府开馆修史,专门设立国史馆,专门设立历史研究、历史编撰的政府机构,从制度上保证史书、志书的修撰得以顺利进行。

关于中国远古的史学机构记载较少,只有《礼记》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普遍设有史官,西汉设太史令,官职世袭,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不仅是藏书机构,也是史学机构。魏晋设有著作郎修史。尤其是到了宋朝时,开设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由宰相监修,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等。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政府修史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所跨年度很长,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复杂,史家个人的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唐初由史馆修八史,集体创作,国家领导支持,宰相监修,既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史馆在修史中的地位、作用得到确立。为了使国史馆了解当代的事情,积累文献史料,朝廷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衙门将档案移交史馆。由于设立史馆成为固定的制度,修史也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史馆修史保证了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①。

这种“官修史书”值得我们借鉴。校史是学校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外界或者学校后来者认识学校最重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其对延续学校历史、建设校园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须确保校史的权威性。故而,校史的编写工作必须由学校设立正式的编写机构,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并由学校相关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专职负责校史的编研工作。如此一来,由学校领导具体负责,可以确保校史政治上的权威性,由制度确定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校史编写,又可以确保校史著作技术上的权威性。唯有确保这两个权威性,校史研究才会保持延续不断地发展势头。

两个权威性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可以使校史编写任务取得学校兄弟部门的大力配合。众所周知,校史研究不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而只是教学科研的辅助,因此校史工作并不为广大师生员工所重视。校史研究政治上的权威性可以大大推动学校各部门对校史研究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为校史研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而校史研究的技术权威可以确保校史成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而赢得学校师生员工的认可和欢迎。其二,校史

研究是一种文化工作,不会像科研项目、基本建设那样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并且资料搜集、出版等费用不菲。确保校史研究的两个权威性,可以为校史研究争取到相应的经费,使校史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其三,现今许多学校的校史研究,都是由宣传部、校办或类似部门承担,作为学校迎接校庆、接待领导和外校嘉宾的临时性工作,需要时仓促而就,往往作为一种宣传性的材料而出版。这种单纯宣传性的工作与当初教育部要求高校编写校史,汲取办学经验教训的初衷相去甚远,也使校史研究的功用和效能大打折扣。确保校史研究的两个权威性,可以使校史研究走出临时性、单纯宣传性的尴尬境况,与教育学、历史学、档案学相结合,实现校史工作“研究化”,从而真正实现教育部要求校史编写的价值和意义,提升校史研究的层次和品位。

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当被问及为什么文学家多而史学家少时,他解释道:“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他提出了对史学家三个方面的要求,即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要有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文字要简洁,条理要清楚,叙人叙事要生动,文笔简练,又要抓住要害。所谓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既要求史学家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又要求能鉴别史料的真伪。所谓史识,是指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规律,如何判断历史。尽管史学、史才很好,叙述很有条理,文章很有文采,知识也很丰富,考证也很精细,但只要认识错了,观点不正确,其著作也会丧失价值。

清朝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在刘知几的基础上又提出“史德”。“史德”是对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要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古代史学大家对历史研究者提出的素质要求对于今天校史研究者同样适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许多学校的校史研究不仅要涉及清史、民国史,更要面临现代史,校史研究者必须“才、学、识、德”兼备,才能很好地处理校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研究现、当代史所遇到的最主要的几个困难,都必须依赖“才、学、识、德”来解决。

首先,现、当代史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样一件史实,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待,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同时,历史发展的后果、影响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判断。当历史上新生事物刚刚出现,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不容易看清楚,很难预见它将如何发展,很难判定其结果和影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历史事件中间,就看不清这段历史的全部情况,不容易把握其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向。所以,要研究当代史,修史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史识”,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事件的内在联系。以东北大学校史为例,

信息共享空间环境下的开放存取构建策略

□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杨爱玲

摘要 本文提出了在信息共享空间环境下参与、构建开放存取的思路,并就其意义、可行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参与、构建开放存取的三大策略——自研自建策略、合作共建策略以及开发组织策略。

关键词 信息共享空间 开放存取 构建策略

开放存取,是一种基于信息自由、开放、公平传播与获取的思想,起因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信息交流危机”,其后逐渐形成一种信息交流机制,其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共享。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是近代学术信息交流史上的一次革新,这种信息交流机制的实现将有利于解决传统模式下学术信息出版周期长、获取费用高、搜寻检索难等困扰已久的问题,将对国际学术界、图书情报界、出版界以及其他信息服务行业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信息共享空间作为信息服务领域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信息交流与学习的理想境地,也必将会迎来开放存取运动给其带来的难得机遇。因此,把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与开放存取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以开放的理念参与开放存取运动,信息共享空间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在信息共享空间环境下参与、构建开放存取的意义

1.降低信息共享空间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信息共享空间主要由信息资源、环境资源和技术资源三部分组成,其中信息资源是信息共享空间最基本的资源,具有基础性作用。开放存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解决信息共享空间的经费问题提供了契机。首先,开放存取运动倡导的一种理念——读者应该能够自由获取各类学术信息资源而不需支付费用,这有力地冲击了出版商的获利意图和动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开放存取运动的快速发展,可以为信息共享空间提供大量学术信息资源,大大降低了信息共享空间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

东北地方势力为了培养人才、抵御日俄侵略,在东北地区内忧外患加剧的背景下创立了东北大学。如果我们完全按照传统的史学眼光,仅仅因为东北地方势力属于军阀势力而贬低东北地方势力及其所创立的东北大学的话,那么就忽略了他们在开发建设东北地区、抵抗外敌入侵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背离了“全民族抗日”的历史事实及中共关于“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科学论断。因此,校史研究者必须具备非凡的“史识”,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上来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东北地方势力及其所创办的高等教育^[1]。

其次,研究现、当代史存在资料方面的困难。研究现、当代史资料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不容易看到。当代史由于时间距离近,资料被完整地保存,散失少,所以有大量的资料。另一方面,虽然史料很多,却又不容易看到。因为许多重要的史料没有公开,造成研究上的困难。国家档案一般规定有解密期限,常常是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看不到原始档案,很难知道历史事件的底细和真相。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非凡的“史学”,才能破解资料问题上存在的两大难题。例如东北大学原校长张学良的档案至今没有完全发表,所以关于“西安事变”后有关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的一些史实——

2.开辟信息共享空间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为信息共享空间资源获取开辟了一条捷径,可以方便地从信息网络中发现开放存取资源库并获取有用的学术信息资源。开放存取学术信息资源相对网络上其他普通信息资源有以下几方面优势:一是同类资源相对集中。二是信息资源质量较高、可靠性较好。三是获取便捷。我们根据开放存取资源登记系统直接登录网站便可下载。

3.拓展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功能。开放存取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汲取已有经验,一方面要广泛收集开放存取信息资源,整理建库并提供利用,一方面要根据自身特色建设或参与建设学术信息资源开放存取平台,建立信息交流、共享的全新平台,此外信息共享空间还可以提供开放存取学术信息资源站点导航服务等。因此,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范围将得到进一步延伸。

4.提升信息共享空间的影响力。信息共享空间可以受益于开放存取运动的快速发展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不少图书馆、信息机构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清华大学图书馆主页上的“推荐学术站点”栏目,推荐了国内外一些预印本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主页上开设的“网络数据库”,介绍了开放存取的概念并提供了一些开放存取资源链接等,这种尝试受到了广大科研人员的普遍关注和赞赏。信息共享空间应顺潮流而动,与图书馆、科研机构及其他信息机构一道,力争成为开放存取运动的倡导者和率先践行者,使开放存取服

如南京政府彻底整顿东北大学的前因后果——至今为止尚未完全探清。校史研究者必须熟知和综合其他已经公布的史料——如关于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档案——才能“曲径通幽”般的大致理清其中的重要线索。

第三,由于当代史距离时间很近,很多历史人物还健在,或者是他们的后代还健在,牵扯到利害关系、感情因素,写当代史要秉笔直书就更困难,会碰到很多干扰。例如在1937年国民政府“彻底整顿”东北大学,臧启芳受国民政府委派前往北京接收东北大学,遭到以时任秘书长、代校长周鲸文为首的东北大学师生的强烈抵抗,发生冲突。现在虽然两位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的子嗣与东北大学关系都较为密切,但校史研究者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还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还得根据历史材料如实记载此一事件,为后人留下这段真实的历史。

总之,中国古代的优良修史传统对校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在今天的校史研究中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 [1]李必忠.简论我国的官修史传统[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2]王晓峰,陈均.校史研究:寻求大学的主题精神[J].兰台世界,2010(11).